

# CEO 权力、审计行业专长与税收激进度

谢盛纹,田 莉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税收激进行为可视为一种公司代理问题,代理人特征无疑会影响税收行为表现。以我国 2007—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 CEO 权力作为代理人特征的切入点,探讨其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以及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CEO 权力越大,公司税收激进度越高;进一步地,纳入审计监督机制后,所聘事务所的审计行业专长对该关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可为税收政策制定及监督机制完善提供有益参考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 CEO 权力;CEO 个人特征;审计质量;审计行业专长;税收激进度;税收规避行为;实际税率;公司代理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4)05-0031-09

## 一、引言

与公司代理中存在的众多问题一样,税收激进行为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且税收激进行为具有随委托代理双方的特征差异而表现不一的特点。具体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不同,公司的避税行为也有所不同<sup>[1]</sup>;同时,公司管理层个体特征(比如 CEO 的管理风格或任期长短)的不同,公司的税收激进行为亦将呈现出显著性差异<sup>[2]</sup>。事实上,任何具有“自利动机”的行为主体都有可能利用代理机制来谋取私利,公司管理层对各种所谓“合法节税或避税”手段更是乐此不疲,他们完全有可能采取税收激进行为来为公司留存更多的经济收益,进而为自身谋求更多的潜在利益。我们认为,CEO 权力作为代理人主体特征的综合反映,其对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与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拟以我国 2007—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 CEO 权力视角分析公司税收激进行为,实证检验 CEO 权力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同时,考察审计行业专长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一方面,本文以 CEO 权力为视角探讨代理人主体特征对公司税收激进策略的影响,拓展该领域的文献研究;另一方面,从审计行业专长的角度探析外部审计对 CEO 权力与公司税收激进度之间关系的约束效应,为审计对税收激进监督效率的提高提供有效路径。

## 二、文献回顾

作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国外众多学者对税收激进度进行了研究。Frank 把税收激进看作是各种节税与避税的暗箱操作<sup>①[3]</sup>。Slemrod 的研究发现公司通过税收激进策略切实可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可将税收资源更多地留存在公司内部,以资公司扩张或谋求个人私利<sup>[4]</sup>。在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因素方面,Rego 认为规模越大的公司,税收激进行为更严重<sup>[5]</sup>。Wilson 认为跨国经营的公司税收激进度更高<sup>[6]</sup>。Graham 和 Tucker 的研究结果表明,低债务的公司更容易实施激进的税收策略<sup>[7]</sup>。

**[收稿日期]** 2014-05-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62010)

**[作者简介]** 谢盛纹(1970—),男,江西瑞金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田莉(1993—),女,甘肃天水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研究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sup>①</sup>现有文献用是否“激进”来衡量公司避税策略的程度,激进性被界定在合法和违法之间,因此,激进的税收行为范围宽泛且属于广义避税行为。

Phillips 基于委托—代理框架,发现公司管理层的税后会计收益激励机制导致了税收激进行为<sup>[8]</sup>。Dyreg 和 Lindsey 发现公司避税决策受公司高管个人特征的影响,公司高管凭借真实交易进行利润操纵或盈余管理,并造成应税收益下降,从而达到减少税收支出的目的<sup>[9]</sup>。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股权、盈余管理和高管激励等因素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方面。吴联生以实际税率衡量税收激进度,发现了国有股权与税收激进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进一步发现与税收优惠公司相比,非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正向税负效应更显著<sup>[1]</sup>。叶康涛发现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进而规避相应的所得税负<sup>[10]</sup>。吕伟和李明辉认为丰厚的高管激励增强了高管愿意承担的避税风险的阈值,公司税收激进度由此增加并在监管较弱的环境下更为明显<sup>[11]</sup>。张嘉兴和傅绍正认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元素,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抑制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且能够起到较好的外部监督功能<sup>[12]</sup>。金鑫和雷光勇为公司税收激进活动这一代理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他们用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衡量审计质量,得出高质量外部审计对企业税收激进活动具有有效制约作用的结论,并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收激进活动治理效率的差异<sup>[13]</sup>。

综上可知,公司层面的某些因素会影响公司的税收表现,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可以抑制公司税收激进度,管理层的一些个体特征对税收激进度也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有学者研究认为以税收收益为基础的高管激励机制显著促使了 CEO 采取激进的税收策略<sup>[8,14]</sup>。进一步地,Lucian 和 Jesse 认为 CEO 权力是高管激励机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sup>[15]</sup>。Finkelstein 认为 CEO 权力还是公司代理人(管理层)主体特征的综合反映<sup>[16]</sup>。故此,我们认为,CEO 权力很有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税收激进策略,但目前却鲜有文献研究涉及这一论题,这为我们留下了研究空间。所以,本文欲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性的研究,利用我国的市场数据检验公司 CEO 权力与公司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具备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具有更强的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这些事务所的审计效率也更高<sup>[17]</sup>,因此,我们还将从审计行业专长视角进一步考察外部审计对 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关系的影响。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

在现代公司中,所有者将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委托于代理人(公司管理层),委托代理双方的行为目标并不全然相同,此时,管理者的“自利动机”就有可能促使其采取税收激进行为来为自己牟取私人利益。事实上,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作为管理层核心的 CEO,其个体权力对公司税收筹划策略的影响是十分可观的。如果公司股东、董事会和 CEO 的权力制衡机制被弱化甚至打破,CEO 受外界约束力度减弱,则这必将导致 CEO 利用权力牟取私人利益的寻租途径更加多元化,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寻租的能力大大增强。进一步地,由于管理层实施税收激进的手段通常都较为隐蔽,避税交易一般都较为复杂且不透明,这都有利于 CEO 匿藏其寻租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 CEO 的税收激进动机;同时,不断积累和膨胀的 CEO 权力为税收激进提供了稳定安全的实施环境和技术保证,可以避免税收激进行为被股东或外部监管者察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 CEO 权力越大,公司避税策略有可能越激进,即税收激进度越高。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sub>1</sub>: 限定其他条件,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正相关。

#### (二) CEO 权力、审计行业专长与税收激进度

作为外部治理机制重要元素之一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重大,它不仅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抑制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发挥很好的外部监督功能,该功能在市场法制环境较弱的情况下更加明显。因此,作为代理问题表现形式之一的税收激进行为,自然也应该受到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督。事实上,高质量的审计不仅能够起到降低代理成本、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也更有可能制约公司 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高质

量外部审计本身就可以有效制约公司税收激进活动<sup>[13]</sup>;同时,审计监督体制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审计报告对管理层决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尽管以 CEO 为首的公司管理层意欲且可以通过制定激进的避税策略来牟取自身利益,但是考虑到高质量审计对此类激进行为的监督与披露,并有可能出具更严厉的审计报告,进而可能引起市场低迷反应和(或)所有者问责等严重经济后果,CEO 又可能因此被迫主动减少税收激进行为,降低税收激进度<sup>[18]</sup>。

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不仅拥有对应行业的具体交易特点、业务流程等行业知识和技能,且更熟悉行业情况,其专业判断能力也将由此得到增强,风险评估、审计计划的制定与修改以及进一步审计程序都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其审计的财务报表中若存在重大错报也将更容易被识别。所以,经由他们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具有更低的应计盈余。而税收激进度的实现多数都仰仗于应计盈余的操纵,因此,我们初步推断,事务所的审计行业专长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CEO 采取税收激进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了公司的税收激进度。事实上,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除了掌握行业专门知识外,对于与行业相关的税收法规和政策也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能够实施更加有效的审计程序,更有利于审计外部监督作用的发挥,公司的税收激进行为更易被识别与发现<sup>[19]</sup>。此外,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通常具有良好的声誉,一旦事务所被发现隐瞒客户的错报信息,其声誉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不仅更有能力也更有动机去揭示与披露 CEO 激进的税收策略。综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sub>2</sub>:限定其他条件,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正向关系随着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的增强而减弱。

####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遵循研究惯例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2)剔除当年 ST 或 PT 的公司;(3)剔除主要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在此基础上,参照刘行和叶康涛等的研究经验,本文还做了以下筛选:(1)剔除有多个名义税率的公司;(2)剔除当年所得税费用小于 0 的公司;(3)剔除实际税率大于 1 或小于 0 的公司;(4)剔除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小于 0 的公司<sup>[20]</sup>,最终样本观测值数量为 821 个。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CEO 权力的基础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公司年报。此外,本文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 (二) 检验模型和变量设定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ETR_{i,t} = \alpha_0 + \alpha_1 SCORE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E_{i,t} + \alpha_5 BSIZE_{i,t} + \alpha_6 RDINT_{i,t} + \alpha_7 INVINT_{i,t} + \alpha_8 TAXRATE_{i,t} + \alpha_9 AUDIT_{i,t} + \alpha_{10} FOUR_{i,t} + \alpha_{11} LDR_{i,t} + \alpha_{12} CFL_{i,t} + \alpha_{13} GROWTH_{i,t} + \alpha_{14} MB_{i,t} + \alpha_{15} AGE_{i,t} + \alpha_{16} GOV_{i,t} + \alpha_{17} FEE_{i,t} + Year\ Dummies + Industry\ Dummies + \varepsilon_{i,t} \quad (1)$$

$$ETR_{i,t} = \alpha_0 + \alpha_1 SCORE_{i,t} + \alpha_2 SCORE * MS_{i,t} + \alpha_3 SIZE_{i,t} + \alpha_4 LEV_{i,t} + \alpha_5 ROE_{i,t} + \alpha_6 BSIZE_{i,t} + \alpha_7 RDINT_{i,t} + \alpha_8 INVINT_{i,t} + \alpha_9 TAXRATE_{i,t} + \alpha_{10} AUDIT_{i,t} + \alpha_{11} FOUR_{i,t} + \alpha_{12} LDR_{i,t} + \alpha_{13} CFL_{i,t} + \alpha_{14} GROWTH_{i,t} + \alpha_{15} MB_{i,t} + \alpha_{16} AGE_{i,t} + \alpha_{17} GOV_{i,t} + \alpha_{18} FEE_{i,t} + Year\ Dummies + Industry\ Dummies + \varepsilon_{i,t} \quad (2)$$

被解释变量为税收激进度,参照已有文献研究,本文用实际税率(ETR)衡量公司税收激进度<sup>[21-22]</sup>,实际税率越低,表示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越高。进一步地,考虑到公司税款的递延情况和递延税款变化额对实际税率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计算得到的实际税率(ETR1)和“(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 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计算得到实际税率(ETR2)衡量税收激进度。

主要解释变量 *SCORE* 为衡量 CEO 权力的变量。本文参考 Finkelstein 的权力模型(他将 CEO 权力划分为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四个方面),在每个方面分别采用两个虚拟变量,共八个维度来衡量 CEO 权力<sup>[16]</sup>。进一步地,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 CEO 权力的综合衡量指标(*SCORE*)<sup>①</sup>。

本文用某一会计师事务所某一年度某一行业客户资产与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在该年度该行业客户资产的比值来计算该会计师事务所该年度的行业市场份额。基于审计行业专长知识随着行业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本文进而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来衡量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MS*)<sup>[23]</sup>。本文将先按照此规则计算各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并将行业市场份额大于 5% 的事务所定义为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MS1\_5P*)。

*SCORE* × *MS* 为 CEO 权力(*SCORE*) 与审计行业专长(*MS*) 的交乘项,用于衡量 CEO 权力与审计行业专长的交互作用。

参考前人研究<sup>[1,10,13]</sup>,我们在检验模型中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为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按照政治成本假说理论,大公司拥有更高的政治成本,受到社会更大程度的关注,因此更不太可能发生税收激进行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公司拥有更多资源进行激进的税收筹划,以达到避税目的;财务杠杆(*LEV*,为年末负债总额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公司当年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平均余额的比值,其中股东权益平均余额为股东权益期末余额与股东权益上年期末余额的平均值);董事会规模(*Bsize*,为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无形资产比重(*RDINT*,即无形资产净值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存货密集度(*INVINT*,即年末存货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名义税率(*TAXRATE*);审计意见类型(*AUDIT*,非标准审计意见为 1,否则为 0);会计师事务所类型(*FOUR*,若事务所为“四大”则为 1,否则为 0);流动比率(*LDR*,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现金流水平(*CFL*,为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公司成长性(*GROWTH*,为营业收入的增长

表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Panel A: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TR1</i>	821	0.108	0.108	0.077	0	0.304
<i>ETR2</i>	821	0.117	0.120	0.079	0	0.308
<i>SCORE</i>	821	-0.088	-0.112	0.357	-0.822	0.766
<i>MS1_5P</i>	821	0.286	0	0.452	0	1
<i>SIZE</i>	821	21.486	21.477	1.495	16.185	25.672
<i>LEV</i>	821	0.704	0.487	1.400	0.054	11.995
<i>ROE</i>	821	0.135	0.100	0.187	0	1.522
<i>Bsize</i>	821	0.951	0.954	0.090	0.699	1.176
<i>RDINT</i>	821	0.048	0.026	0.071	0	0.464
<i>INVINT</i>	821	0.156	0.134	0.134	0	0.650
<i>TAXRATE</i>	821	0.236	0.250	0.055	0.150	0.330
<i>AUDIT</i>	821	0.096	0	0.295	0	1
<i>FOUR</i>	821	0.056	0	0.230	0	1
<i>LDR</i>	821	1.665	1.254	1.568	0.031	10.296
<i>CFL</i>	821	0.054	0.049	0.090	-0.258	0.380
<i>GROWTH</i>	821	0.610	0.080	2.637	-0.735	22.472
<i>MB</i>	821	3.063	1.775	4.879	0.819	38.783
<i>AGE</i>	821	9.760	10	4.657	1	21
<i>GOV</i>	821	0.574	1	0.495	0	1
<i>FEE</i>	821	13.254	13.122	0.629	12.101	15.384
Panel B:主要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i>ETR1</i>	<i>ETR2</i>	<i>SCORE</i>			
<i>SCORE</i>	-0.069**	-0.069**	1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①CEO 权力八个维度的具体情况是:组织权力用 CEO 是否兼任董事长以及 CEO 是否为公司内部董事这两个虚拟变量衡量;专家权力分解为 CEO 是否具有高级职称和 CEO 任职年限是否够长两个维度;所有制权力用 CEO 是否具有股权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水平两个维度衡量;声誉权力通过 CEO 是否具有高学历和 CEO 是否在外兼职衡量,其中,高学历是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率);投资机会(*MB*,为年末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公司年龄(*AGE*);最终控制人性质(*GOV*,参照前人研究的数据,国有企业为1,否则为0<sup>[24]</sup>);审计费用(*FEE*)。*Year Dummies*为用于控制公司税收激进行为年度间差异的年度虚拟变量。*Industry Dummies*是用于控制行业因素对公司税收激进度影响的行业虚拟变量。

(三) 描述性统计及主要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表

上页表1的Panel A部分列示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实际税率(*ETR1*)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0.108,实际税率(*ETR2*)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17和0.120。实际税率(*ETR1*)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04,实际税率(*ETR2*)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08,这是因为本文剔除了实际税率大于1和小于0的数据,此外这也说明了公司间税收激进度差异较大。*CEO*权力(*SCORE*)的最小值为-0.822,最大值为0.766,说明不同观测值的*CEO*权力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同样反映了变量的数量特征,如:存货集中度(*INVINT*)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和0.650,说明样本公司存货投资情况不尽相同。

Panel B部分为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SCORE*与*ETR1*和*ETR2*均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随着*CEO*权力的增强,公司税收激进度也随之增大。

五、实证结果

(一) 多元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模型(1)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SCORE*与*ETR1*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SCORE*与*ETR2*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在控制其他因素对税收激进度影响的基础上,*CEO*权力大的公司,其税收激进度显著高于*CEO*权力小的公司。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中,*SIZE*与*ETR1*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税收激进度越低,符合政治假说理论<sup>[25]</sup>。*RDINT*、*INVINT*与*ETR1*均显著正相关,这与Gupta和Newberry、Lanis和Richardson的研究结果一致<sup>[25-26]</sup>。*AUDIT*与*ETR1*显著负相关,表明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税收激进度更高。*LDR*和*CFL*与*ETR1*显著正相关,表明流动比率和现金流量比率越高的公司税收激进度越低。*AGE*与*ETR1*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越有可能发生税收激进行为。

下页表3报告了模型(2)的实证检验结果。在模型中,我们用分组回归和检验交乘项的方法验证假设H<sub>2</sub>。在分组回归检验时,去掉交乘项,也即分别按审计行业专长组(*MS* = 1)和非审计行业专长组(*MS* = 0)对模型(1)进行回归。其中,第(1)列是针对非审计行业专长组的检验结果,第(2)列是针对审计行业专长组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加入交乘项(*SCORE* × *MS*)的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SCOR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非审计行业专长组中,在*CEO*权力较大时,税收激进度也较高。第(2)列结果显示*SCORE*的系数不显著且为正向,说明精通行业知识的事务所在很大程度上识别了管理层进行的税收激进行为,导致*CEO*权力的增大对税收激进度的边际贡献较小,因此税收激进度不会随着*CEO*权力的加大而显著增强,这与假设H<sub>2</sub>的预期一致。第(3)列的结果显示*SCORE*系数显著为负,*SCORE* × *MS*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采用分组回归方式得

表2 多元回归分析

	(1) <i>ETR1</i>	(2) <i>ETR2</i>
<i>SCORE</i>	-0.013** (-2.05)	-0.014** (-2.12)
<i>SIZE</i>	0.014*** (4.65)	0.014*** (4.51)
<i>LEV</i>	0.002 (0.80)	0.003 (1.30)
<i>ROE</i>	-0.002 (-0.20)	-0.006 (-0.46)
<i>BSIZE</i>	-0.032 (-1.17)	-0.049* (-1.77)
<i>RDINT</i>	0.081** (2.40)	0.044 (1.29)
<i>INVINT</i>	0.065*** (3.22)	0.094*** (4.56)
<i>TAXRATE</i>	0.422*** (7.66)	0.434*** (7.80)
<i>AUDIT</i>	-0.038*** (-3.76)	-0.042*** (-4.09)
<i>FOUR</i>	-0.015 (-1.40)	-0.015 (-1.37)
<i>LDR</i>	0.005*** (2.95)	0.005*** (3.26)
<i>CFL</i>	0.127*** (4.82)	0.115*** (4.32)
<i>GROWTH</i>	-0.000 (-0.35)	0.000 (0.29)
<i>MB</i>	0.000 (0.32)	0.000 (0.47)
<i>AGE</i>	-0.002*** (-4.28)	-0.003*** (-4.50)
<i>GOV</i>	0.005 (0.84)	0.005 (0.84)
<i>FEE</i>	0.002 (0.37)	0.007 (1.15)
年度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_cons	-0.371*** (-5.85)	-0.398*** (-6.22)
N	821	821
Adj R-squared	0.343	0.369

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到的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sub>2</sub>,即 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正向关系随着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的增强而减弱。第(4)列至(6)列对应第(1)列至(3)列,此时我们只是用实际税率(ETR2)来衡量税收激进度,结果发现,在非审计行业专长组的回归中,SCORE 的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在审计行业专长组的回归中,SCORE 的系数不显著,在加入交乘项(SCORE × MS)的回归中,SCORE × MS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些结果与(1)列至(3)列的结论相同,假设 H<sub>2</sub>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ETR1 非审计行业 专长组	ETR1 审计行业 专长组	ETR1 全样本	ETR2 非审计行业 专长组	ETR2 审计行业 专长组	ETR2 全样本
SCORE	-0.021 *** (-2.80)	0.014 (1.07)	-0.023 *** (-3.08)	-0.021 *** (-2.74)	0.011 (0.84)	-0.023 *** (-3.05)
SCORE × MS			0.036 *** (2.61)			0.034 ** (2.44)
SIZE	0.018 *** (4.82)	0.006 (1.04)	0.014 *** (4.65)	0.016 *** (4.31)	0.008 (1.35)	0.014 *** (4.51)
LEV	0.002 (0.82)	0.005 (0.72)	0.002 (0.80)	0.002 (0.64)	0.013 ** (2.25)	0.003 (1.30)
ROE	0.008 (0.63)	-0.062 * (-1.71)	-0.002 (-0.18)	0.007 (0.55)	-0.068 ** (-1.99)	-0.005 (-0.45)
BFSIZE	-0.049 (-1.42)	0.008 (0.15)	-0.031 (-1.15)	-0.057 (-1.64)	-0.019 (-0.38)	-0.049 * (-1.76)
RDINT	0.060 (1.49)	0.126 * (1.68)	0.086 ** (2.54)	0.009 (0.22)	0.189 *** (2.66)	0.048 (1.41)
INVINT	0.063 *** (2.64)	0.068 (1.53)	0.065 *** (3.21)	0.094 *** (3.89)	0.076 * (1.80)	0.093 *** (4.55)
TAXRATE	0.441 *** (7.03)	0.328 *** (2.70)	0.422 *** (7.70)	0.451 *** (7.07)	0.306 *** (2.64)	0.434 *** (7.84)
AUDIT	-0.041 *** (-3.45)	-0.033 (-1.40)	-0.038 *** (-3.81)	-0.042 *** (-3.52)	-0.042 * (-1.87)	-0.042 *** (-4.14)
FOUR	-0.028 ** (-1.99)	0.010 (0.52)	-0.017 (-1.52)	-0.033 ** (-2.31)	0.007 (0.39)	-0.016 (-1.48)
LDR	0.005 *** (2.65)	0.006 (1.39)	0.005 *** (2.97)	0.005 *** (2.82)	0.006 (1.53)	0.005 *** (3.28)
CFL	0.125 *** (4.10)	0.180 *** (2.99)	0.127 *** (4.83)	0.127 *** (4.11)	0.130 ** (2.27)	0.115 *** (4.33)
GROWTH	0.000 (0.34)	-0.001 (-0.42)	-0.000 (-0.14)	0.002 (1.30)	-0.001 (-0.44)	0.000 (0.48)
MB	0.001 (0.98)	-0.003 (-1.39)	0.000 (0.48)	0.001 (0.80)	-0.006 *** (-2.71)	0.000 (0.62)
AGE	-0.003 *** (-4.08)	-0.002 (-1.57)	-0.002 *** (-4.32)	-0.003 *** (-3.83)	-0.002 * (-1.92)	-0.003 *** (-4.53)
GOV	0.006 (0.97)	0.008 (0.64)	0.004 (0.83)	0.005 (0.81)	0.007 (0.60)	0.005 (0.83)
FEE	0.006 (0.86)	-0.001 (-0.05)	0.003 (0.53)	0.010 (1.38)	0.002 (0.16)	0.007 (1.30)
年度 行业 _cons	控制 控制 -0.496 *** (-6.01)	控制 控制 -0.162 (-1.36)	控制 控制 -0.380 *** (-6.02)	控制 控制 -0.493 *** (-5.87)	控制 控制 -0.168 (-1.49)	控制 控制 -0.407 *** (-6.37)
N	586	235	821	586	235	821
Adj R-squared	0.370	0.296	0.348	0.386	0.407	0.373

(二) 稳健性测试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做了以下稳健性测试:(1)考虑名义税率税收激进度的替代度量;(2)以事务所审计费用来计算其行业市场份额,重新取得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的度量。

1. 考虑名义税率税收激进度的替代度量

由于税收政策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享受着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使得各上市公司名义税率不尽相同。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用名义税率减去实际税率(ETR1、ETR2)的税率差异(RATE1、RATE2)作为衡量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另一指标,以消除名义税率对数据结果的影响。名义税率减去实际税率的税率差异越大,表示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越高。

表4的Panel A和Panel B报告了以RATE1和RATE2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SCORE与RATE1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SCORE与RATE2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在控制其他因素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后,CEO权力大的公司其税收激进度显著高于CEO权力小的公司。在以RATE1为因变量的(1)列、(2)列和(3)列中,非审计行业专长组中SCORE的系数显著为正,审计行业专长组中SCORE的系数并不显著,交乘项SCORE×MS的系数显著为负。以RATE2为因变量的(4)列、(5)列和(6)列的结果与(1)列至(3)列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4 税收激进度的稳健性测试

Panel A		(1)	(2)				
		RATE1	RATE2				
SCORE		0.013 ** (2.08)	0.014 ** (2.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0.369 *** (5.80)	0.395 *** (6.17)				
N		821	821				
Adj R-squared		0.420	0.425				
Panel B		(1)	(2)	(3)	(4)	(5)	(6)
		RATE1	RATE1	RATE1	RATE2	RATE2	RATE2
		非审计行业 专长组	审计行业 专长组	全样本	非审计行业 专长组	审计行业 专长组	全样本
SCORE		0.022 *** (2.85)	-0.015 (-1.09)	0.023 *** (3.13)	0.022 *** (2.80)	-0.011 (-0.87)	0.023 *** (3.11)
SCORE × MS				-0.037 *** (-2.67)			-0.035 ** (-2.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495 *** (5.97)	0.164 (1.39)	0.378 *** (5.97)	0.492 *** (5.85)	0.169 (1.51)	0.405 *** (6.33)
N		586	235	821	586	235	821
Adj R-squared		0.423	0.439	0.425	0.424	0.506	0.429

2. 审计行业专长的替代变量

本文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替换其客户资产,重新计算事务所行业市场份额,并将行业市场份额大于5%的事务所定义为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MS2\_5P),重新对H<sub>2</sub>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结果见下页表5。

表5的结果显示,在以ETR1为因变量的(1)列、(2)列和(3)列中,非审计行业专长组中SCORE的系数显著为负,审计行业专长组中SCORE的系数并不显著,交乘项SCORE×MS的系数显著为正,

所有系数均与前文结果对应一致。在以 ETR2 为因变量的(4)列、(5)列和(6)列中,各主要系数也与前文结论对应一致。

表 5 审计行业专长的稳健性测试

	(1)	(2)	(3)	(4)	(5)	(6)
	ETR1 非审计行业 业专长组	ETR1 审计行业 业专长组	ETR1 全样本	ETR2 非审计行业 业专长组	ETR2 审计行业 业专长组	ETR2 全样本
SCORE	-0.019 ** (-2.43)	0.009 (0.76)	-0.020 *** (-2.72)	-0.020 ** (-2.50)	0.011 (0.93)	-0.022 *** (-2.87)
SCORE × MS			0.025 * (1.85)			0.028 ** (2.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471 *** (-5.59)	-0.215 * (-1.90)	-0.376 *** (-5.94)	-0.490 *** (-5.75)	-0.228 ** (-2.06)	-0.403 *** (-6.31)
N	572	249	821	572	249	821
Adj R-squared	0.345	0.354	0.345	0.367	0.427	0.371

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公司税收激进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代理问题,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基于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结构等视角进行的,而往往忽略了 CEO 权力这一重要的代理人特征要素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本文采用 2007—2011 年度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 CEO 权力与公司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 权力越大,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越大;当公司的审计师不具有审计行业专长时,CEO 权力的增强会加强公司的税收激进度;当公司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审计行业专长时,CEO 权力的增强对税收激进度的助长作用被弱化,即审计行业专长有效抑制了 CEO 权力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将 CEO 权力引入对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公司税收激进度研究的文献,同时拓宽了 CEO 权力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就公司治理而言,要重视和理性认识 CEO 权力,并加强对 CEO 的授权和行权监督,监控其权力大小,使其权力始终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之内,这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税收激进度;(2)就税收政策制定部门而言,明晰税收政策能够压缩 CEO 制定税收激进策略的政策空间,进而减少 CEO 因自利动机而进行的税收激进行为,改善税收征管情况;(3)就市场监管部门而言,对公司执行更加严格和更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对公司的税收激进行为起到更好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基于此,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并加强公司与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之间的聘任关系,对税收激进度有更好的抑制作用;同时积极鼓励会计师事务所采取行业专门化发展战略,整体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行业专长程度,以使其能在整体层面上抑制公司税收激进行为。

### 参考文献:

- [1] 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 经济研究, 2009(10): 109-120.
- [2] 张天敏. 管理者与企业避税行为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3] Frank M M, Lynch L J, Rego S O.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2): 467-496.
- [4] Slemrod J.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 57(4): 877-899.
- [5] Rego S O. Tax-avoidance activities of U. 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20(4): 805-833.



- [6] Wilson R 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3): 969-999.
- [7] Graham J R, Tucker A 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1(3): 563-594.
- [8] Phillips J D. Corporate tax-planning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compensation-based incentiv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3): 847-874.
- [9] Dyreng S D, Lindsey B P. Us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data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oreign operations located in tax havens and other countries on U. S. multinational firms' tax rat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47(5): 1283-1316.
- [10] 叶康涛. 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 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2): 205-224.
- [11] 吕伟, 李明辉. 高管激励、监管风险与公司税负——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5): 71-78.
- [12] 张嘉兴, 傅绍正. 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审计与盈余管理[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2): 3-13.
- [13] 金鑫, 雷光勇. 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与税收激进度[J]. *审计研究*, 2011(5): 98-106.
- [14] Sonja O R, Ryan W. Executive compensation,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future firm performance[R]. Working Paper, 2008.
- [15] Lucian A B, Jesse M F.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6]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3): 505-538.
- [17] 刘明辉, 王扬. 审计师特征、审计质量与审计师营运效率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5): 20-33.
- [18] 李增泉. 实证分析: 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J]. *会计研究*, 1999(8): 16-22.
- [19] Dunn K, Mayhew B. Audit fir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client disclosure quality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4, 9(1): 35-58.
- [20] 刘行, 叶康涛. 公司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J]. *会计研究*, 2013(6): 47-53.
- [21] Hanlon M, Myers J N, Shevlin T. Dividend taxes and firm valuation: a re-examin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3, 35(2): 119-135.
- [22] Hanlon M,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3): 127-178.
- [23] Hogan C E, Jeter D C.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by auditors[J]. *Auditing*, 1999, 18(1): 1-17.
- [24] 辛清泉, 林斌, 王彦超.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 *经济研究*, 2007(8): 110-122.
- [25] Gupta S, Newberry K.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 16(1): 1-34.
- [26] Lanis R, Richardson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ax aggressive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1): 86-108.

[责任编辑: 刘 茜]

## CEO Power, Audit Industry Expertise and Tax Aggressiveness

XIE Shengwen, TIAN Li

(Center for Accounting Develop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10013, China)

**Abstract:** Corporate aggressive tax activities is a kind of agency problem, agent characteristics undoubtedly influences corporate tax behavior.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1 as a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CEO power influence to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by viewing CEO power as an agent characteristics entry point, as well as a restraint function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audit as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ur empiric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rporate with stronger CEO power has higher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and further, after the audi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udit industry expertise of appointed accounting firm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is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may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support for tax policy formul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perfection.

**Key Words:** CEO power; CEO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udit quality; audit industry expertise; tax aggressiveness; tax avoidance; effective tax rate; corporate agency